[动 态]

纪念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成立四十周年暨第三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何 孝 荣

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是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高校第一批研究机构之一。四十年来，明清史研究室遵循创始人郑天挺教授的学术主张，与国内外同行切磋交流，促进了明清史研究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友谊。为了总结四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推动学术进步，进一步增进中外学者之间的友谊，经国家教委批准，"纪念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成立四十周年暨第三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8月1日至4日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国和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明清史专家、学者近七十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由会议副主席、南开大学历史所所长南炳文教授主持，会议主席、南开大学历史所郑克晟教授致开幕词，会议秘书长、南开大学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白新良教授报告研究室四十年工作。开幕式后，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出席开幕式的贵宾以及部分明清史研究室的历届毕业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明清史研究室成果展览。在随后几天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考察中，与会的专家、学者各自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并进行热烈讨论，畅所欲言。大会开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

提交大会的论文七十余篇。这些论文不仅涉及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和角度多样，而且内容广泛，注重使用最原始的文书、档案资料，见解深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明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下面按其内容对提交论文进行摘要介绍。

一、明清政治和军事

关于选士任官制度，城井隆志(日本)的《明代进士的任官与升迁》以《嘉靖丙辰科同年世讲录》为依据，认为科举及第时二甲、三甲的资格差别及初任官职的不同，对其后来的升迁具有重大影响。野田彻(日本)的《明代宦官及其参随》把研究角度对准明代的宦官及其参随——皂隶与军伴，考察了宦官占有参随的目的及其影响。陆平舟(日本)的《清代地方官、幕友、胥吏三层结构的地方支配的形成》探讨了清代胥吏、幕友的产生原因及地位；分析了地方官、幕友、胥吏三层结构的地方衙门的利与弊。方裕谨的《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始末》根据一档馆藏军机处全宗上谕档，对道光十年书吏伪造捐纳凭照案进行了研究。詹家豪的《明代国子监生历事制度述论》分析了明代国子监生历事制度的内容及变化，探讨了其失败原因。此外，王云的《明代女官制度探析》、杨旸的《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郭培贵的《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也是有关研究的重要论文。

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对政治的影响，胡凡的《立储之争与明代政治》分析了明

代影响立储的各大势力，认为立储之争对明代政治有重大影响。何孝荣的《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论述了万历年间国本之争的起因、过程，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辨，指出国本之争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杜家骥的《清初宗室的宗人关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从清初宗室内五个宗支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清初政局的变化原因及这种关系对政治的影响，并对清初一些重要政治疑案提出自己的看法。郭成康的《清康雍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考察当时禁南洋案中央决策所依据的原则，强调了督抚、地方缙绅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并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已面临严峻挑战。

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王日根的《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论纲》研究了明清基层社会在面临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后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认为明清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变迁与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发达及其导致的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周绍泉的《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里长和老人》通过对徽州契约文书、诉讼案卷等资料的研究，指出老人、粮长、里长在明清时期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村地方行政仍行使其职能，所谓"乡绅论"应重新评价。山本英史（日本）的《清代中叶的里役与民众》也用《洞庭山禁革现总案》史料证明，在清代中叶的某些地区，仍存在着与里甲正役一职相似的现总，实际上发挥着村落行政的机能。李映发的《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引证地方档案史料，指出清代州县以下行政组织不单有保甲制度，还存在着里甲和图甲制度，另外还有镇、乡、村、寨等。刘正刚的《清代四川天后宫考述》以清前期福建移民在四川各地修建的移民会馆—— 天后宫为研究对象，认为它具有联谊乡情、参与地方政务等功能，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

关于军事制度和军事问题，肖立军的《明代边兵与外卫兵制》考察了明代边兵与外卫的各方面问题，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客观评价。赵载德（韩国）的《再论四旗的建旗问题》从语言学、文字学的角度对满语"固山"(gūša)、旗纛(tu)进行分析，探讨了四旗的建立过程。松浦章（日本）的《明清时代的海贼》认为，"海贼"大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他们保护缴纳商税的商船的安全，也密切了与民众的关系。白新良的《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论述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指出它对朝鲜历史及中朝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李莉、李光辉的《明清马政》、牟永贵、姜祖鹏的《郑成功的军事制度探析》也都是引起与会者注意的论文。

二、明清经济、区域及中外关系

关于经济，林延清的《论明朝嘉靖中后期的改革活动》认为，嘉靖中后期开始的以赋役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活动缓和了社会矛盾，是后来张居正改革的先声和准备。宫崎洋一（日本）的《清代 17—18 世纪的技术与开发》认为，清代 17—18 世纪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跨越省界的传播，中原内外的开发，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封越健的《清代商业资本的来源、组织形式及经营方式》则对清代商业资本进行研究。

关于区域，王兴亚的《明清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考察了北方棉纺织业的生产和销售，指出北方棉布从明末开始已代替松江布占领了北方市场。川胜守（日本）的《乾隆朝云南铜京运与天津市发展》提出，18 世纪雍正朝至乾隆朝云南铜运往北京促进了天津市的发展，对研究天津史很有启发。桥本英一（日本）的《考察天津关的海税》研究了清代天津关海税的变化，并剖析了变化的原因。香坂昌纪（日本）的《清代的北新关和商品流通》从北新关与主要商品流通经路、北新关与诸分司、北新关的税课和税目、关税负担与商民对策等方面考察，揭示当时

商品流通的实际状态。吴仁安的《清代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探讨了清代上海地区望族的构成及变迁，是上海史研究的重要论文。

关于人口迁移和人口问题，黄松筠的《论明代辽东流人文化》将明代谪戍辽东的流人作为整体加以研究，探讨其文化特质。周祚绍的《论乾嘉时期的人口问题和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论述了清朝乾嘉时期人口的无限制膨胀和洪亮吉对此的思考，剖析了洪亮吉人口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张洪祥的《论近代华北农民"闯关东"的历史功绩》考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次移民活动，并总结经验，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关于中外关系，郭蕴静的《康雍时期的对日贸易与中日关系》论述了当时清朝政府和日本当局对中日贸易的不同态度，并探讨其对两国贸易及两国关系的影响。米镇波的《论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对俄外交》认为，光绪初年左宗棠西征时提出的对俄外交思想是很有见地的，在实践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徐明德的《论16—18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在会上也引起了讨论。

三、明清人物、文化及其它

关于人物，关汉华、颜广文的《朱元璋的监察思想及其影响》论述了朱元璋监察思想的内容及影响，提出不应过分夸大其消极作用。李梦芝的《论弘治帝的历史地位》认为，明孝宗在"法祖"的旗帜下推行新政，"应作为成功的守成之君载入史册"。郑克晟的《论董谷刘仕义及明朝"超越前代"说》对董谷、刘仕义的生平进行考证，并探讨了他们的明朝"超越前代"说。谢景芳的《努尔哈赤的政治思想及其时代特征》论述了努尔哈赤王权专制思想的变化及时代背景，认为努尔哈赤晚年政治思想的倒退给满族发展、清初政治都带来消极影响。李治亭的《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认为，"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杨启樵（日本）的《从活计档看雍正皇帝的私生活》利用故宫藏《活计档》对雍正皇帝的私生活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接近真相的雍正像。暴鸿昌的《论方苞与康雍时期的理学》揭露了方苞以理学自居而又行不守理的丑陋行径，指出这种假道学是康雍时期皇帝倡导理学的产物。杨爱国的《郑燮哲学思想及其政治倾向》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

关于图书编纂，松本隆晴（日本）的《论〈元史〉的编纂意图》指出，明初草成《元史》在于强调明王朝专制统治的正统性和消抹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关系，"是一项政治目的强烈影响编纂过程的政治行为"。南炳文的《明代纂修玉牒考略》从明代玉牒纂修的机构、人员、时间、物资供应及玉牒的体例、篇幅、收藏、可信性、功能等方面，对明代玉牒的纂修及其价值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李小林的《史继偕及其〈兵制志〉》对史继偕的生平及其所著《兵制志》进行了考察，认为万历年间陈于陛主持的官修国史活动在中国史学史上应有一定地位。乔治忠的《〈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指出，《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是清代方志学繁荣兴盛的契机。宝日吉根的《〈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利用故宫档案等史料，论证第一部《蒙古王公表传》为汉文写成。

关于《红楼梦》，张书才的《"雍正帝晚年曾纳香玉为妃、封后"析》对新近出版的所谓"红学专著"《红楼解梦》的"雍正帝晚年曾纳香玉为妃、封后"说进行辨驳，指出其纯属"逞臆之妄谈"。张文引起广泛共鸣，与会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呼吁维护红学、清史学及整个历史学研究的严肃

性。李正中的《〈红楼梦〉瓷器考辨与史证》通过对《红楼梦》中瓷器的考辨，为清史研究提供有力史证。

关于中国文化，李忠熹（韩国）的《试论现代东西知识分子的认识差异与工作的角色》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分子认识与价值取向的不同。魏鉴勋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负面文化效应论略》考察了负面文化干扰、破坏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关于研究回顾，王俊义的《略论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清代以来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期待更多、更好的有关论著的问世。关于宗教政策，甘德星（香港）的《清入关前对喇嘛之压抑》认为，入关前满人压抑喇嘛乃基于喇嘛的违法乱纪、不守清规，而非一般所说的军事、文化原因。关于社会风俗，常建华的《试论明清时期的停丧不葬风俗》发言就明清时期停丧不葬风俗的普遍性、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和官员的对策进行了探讨。关于养生学，汪茂和的《明清学者与养生学》发言指出，明清学者普遍重视养生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值得深入挖掘。

另外，还有不少明清史专家、学者原拟与会，但临时因故未能出席。他们有的寄来了论文，如陈福坡（日本）的《戚继光平乱》、张中政的《明代的驿传制度与陕西的驿递》、魏连科的《说〈明初宫廷疑案考〉》等；有的寄来了论文摘要，如山根幸夫（日本）的《崇祯 12 年济南府城的陷落》、罗冬阳的《明清时期的县》、曹国庆的《明代铅山费氏与宁王宸濠叛乱》、张海瀛的《明代山西田粮管辖系统研究》、姜晓萍的《明清商业伦理探析》、夏维中的《太平天国前苏州地区农业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叶显恩的《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范金民的《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朱亚非的《明清之际西学在山东的传播与影响》、姜胜利的《清人对明亡原因的认识》、李喜所的《评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的日本观》、王政尧的《〈燕行录〉与康乾时期戏剧文化》等。这些论文或论文摘要也对各自问题进行了精到的研究，并多在会上作了交流。